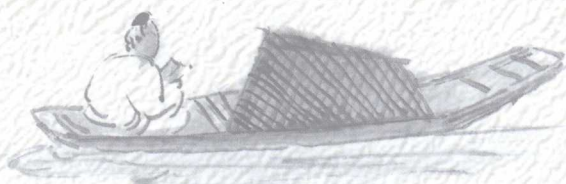


中华传统儒家

人文文化研究

主 编 刘忠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传统儒家

人文文化

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刘忠孝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207 - 07842 - 1

I. 中... II. 刘... III. 儒家—人学—研究—中国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646 号

责任编辑: 徐 冲 姜海霞
封面设计: 于克广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

主 编 刘忠孝
副主编 薛文礼 裴 丽
主 审 庞发现 刘翰德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7842 - 1/G · 1846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言

中华人文化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人文意识的觉醒和人文化思潮的繁兴是人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自由与解放并渴望将其放大的现实历史进程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

中华人文化思想是整个人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文化传统上与其他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中华人文化思想就不仅具有作为一般思想存在的普遍性的一面,更表现出适应自己民族特性的特殊性的一面。

中华人文化思想体系主要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原来是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相互论争的风气,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里的深刻变革。百家争鸣的内容,涉及天人、名实、常变、古今、义利、心性、善恶和礼法制度等各个方面,最终造就了中华人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儒家传统人文化思想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并延展成为中华人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

儒家传统人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建的以树仁、立德、礼义、教化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传统人文化认为,人的教化人人有责,提倡全社会抓人的教化。儒家不但阐明了人们自己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管理自己、开发自己,而且阐明了家庭、学校、国家社会管理者及一切志士贤达都应当自觉担负起教化人的责任。儒家人文化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人和人生的方方面面。儒家强调做人应有自觉的责任觉悟,要坚持以德为本,要有实实在在的本领和才能,要懂礼守法,待人以诚,敬人有道,与人和



谐相处,善于正己化人。

儒家传统人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个人成长、做人与家庭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兴旺发达不可分割地联成一体。体现了个人成长与国家兴旺、社会发展进步的统一。儒家文化的活的灵魂是集体主义。儒家讲的集体不是小团体,而是家与国的一体、国与天下的一体,儒家追求的大目标是构建大同社会,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和美好。正是这伟大的胸怀使儒家文化滋生出了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由于儒家人文化揭示了人和人生存在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对认识人生、驾驭人生、开发人生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因而逐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做人的基本指导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文明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被世界有识之士称为中国的软实力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真理的作用和价值是超时空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及其圣贤们两千多年前揭示的人生道理对当今社会实践仍具有某种指导意义或参考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热播于世界的今天,在某些国家仍然误读中华文明的今天,这本书的出版一定意义上会让某些人读懂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什么是儒家优秀人文化的精髓,我们应当怎样继承。同时,本书的出版也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着眼点。

总之,《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一书凝聚着全体编撰者的心血和汗水。在它即将付梓之时,我们恳请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

刘忠孝

2008年4月于哈尔滨



第一编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概说

- 3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发生论
 - 3 一、儒家人文化发生的自然背景
 - 5 二、儒家人文化发生的经济背景
 - 8 三、儒家人文化发生的时代背景
 - 9 四、儒家人文化发生的学术背景
- 17 中华儒家人文化源流考
 - 17 一、儒家人文化的历史流变及代表人物
 - 47 二、儒家人文化的代表著作
 - 59 三、儒家人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
 - 62 四、儒家人文化的历史评价

第二编 儒家人文化论认识人生

- 69 天人合一
- 79 人性本善
- 99 内圣外王
- 105 群体至上
- 109 重义轻利
- 117 民为邦本
- 125 浩然之气
- 133 家国天下
- 142 入世精神
- 147 人生价值
- 152 和谐之美



目 录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

—— 第三编 儒家人文化论管理人生 —— 163

- 165 孟母择邻
- 172 反躬内求
- 186 诚信无价
- 201 家国至上
- 215 忠孝义礼
- 226 岁寒松柏
- 234 兼济天下
- 241 贵和尚中
- 253 隆礼重法
- 263 君子之风
- 277 管理机制

—— 第四编 儒家人文化论开发人生 —— 288

- 291 志存高远
- 300 厚德载物
- 307 经世致用
- 318 跬步千里
- 328 三人有师
- 337 穷且弥坚
- 345 书中乾坤
- 360 学思并重
- 372 刚健有为
- 381 知行合一

—— 参考文献 —— 392

—— 后 记 —— 396

第
一
编

中华传统
儒家人文化概说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发生论

一、儒家人文化发生的自然背景

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依托于它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舞台,也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场所。中华大地优越而独特的自然条件,是中国形成优秀而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内在物质基础。考察中国传统儒家人文化的发生,应该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自然环境有一个总体性的了解和把握。

中华先民自古生活在亚洲东部辽阔疆域内。西面背靠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部濒临大海,北边是广漠无垠的草原、沙漠,南边有交通阻隔的横断山脉,地域上形成了半封闭状态。

从新生代以来,中国原始地貌的构成和现在相仿佛。中国东临太平洋,境内高山、丘陵、高原、盆地、平原、江河、湖泊、岛屿交错纵横。在广袤的幅员中,南北冷热、东西干湿差异很大。复杂的地形、土壤、气候和水文环境,构成了千姿百态的区域特色,并在各区域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作用下,形成了大同小异的文化风貌,互补地表现出不同条件下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汇合成汹涌澎湃的中华文化洪流。这股洪流是一体和多元的统一。

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下游,黄河流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信念。在过去的两千余年中,黄河曾先后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就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看,除了有泛滥作害的一面之外,黄河又有便利文明发展之处。黄河流域地区土质疏松,土性肥沃,适宜于农耕的发展,原始先民采集野生谷物,经种植驯化而逐渐成为发达的农业文明。仅《诗经》记载的野生植物就有一百多种。黄土高原又有特殊的柱状节理,容易挖穴构屋、冬暖夏凉,所以“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①。

黄河长期以来哺育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黄河流域是远古先民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带。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了

^① 《墨子·辞过》。



以农耕文化为主流的多层次、多成分的有机经济复合体,创造了流传至今并影响深远的东方文明。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决定或不决定,而应该做全面的认识。

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上述三种环境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状态所构成。这三种地理环境之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理环境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只有自然环境,是自在世界。在人类产生之后,完全单纯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因为人类的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然环境,自然也就变成了人化自然。但在人类漫长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的影响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地理环境主要当作自然环境。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起作用。到了近代,就更难以将这三者严格区分开来了。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理环境在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因为:第一,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千差万别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在不同地区 and 不同时期,人类的活动会出现如此不同结果的缘由所在。

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所以在人类的早期,即人类基本上还只能被动地适应现成的环境时,地理环境对人类各方面的活动几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弱。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能力和程度就越大。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是以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为限度的。

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



要比现在大得多,有时往往起了完全隔绝的作用,例如海洋、大江、高山、沙漠、沼泽、丛林都曾是先民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是“历史真正的舞台”,是中华文化赖以产生的摇篮。

在这个“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①的舞台上,相对隔阂的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和独立性的资本和物质保障,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于以“天下”和“四海”概念构想自己生活的世界格局。中国古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四海之内,天下之中,由中而外的顺序是京师、诸夏、四夷。在“华夏—四夷”的天下模式中,所有的外族都被包容在四夷之内。而四夷又可以通过用华变夷、由夷变夏的过程,被纳入中原文化的母体之中。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中华文化稳定而连续地向前发展,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能够基本维持大一统局面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壮大心理支柱,是造成中国文化亘古独立、绵延不灭的重要原因。地域相对封闭还使中国各个领域的文化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内部统一性,根植于这片沃土的哲学、医学、书法、绘画、园林、戏曲等都自成体系,体现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征。

二、儒家人文化发生的经济背景

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天然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比水土流失严重时的含量要高得多。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为草原等植被所覆盖,水土流失相对并不严重。而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常常泛滥改道。当时华北平原北部还有众多单独入海的河流,所以有不少地方会受到这种泛滥改道的影响。近海地带由于地下水位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严重。因此,黄河中下游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的地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结果,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主要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黄河中下游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and 相当辽阔的地域。春秋战国时当地还有

^① 《禹贡》。



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之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毫无地位。从秦朝开始直到清朝初年,历代最稳定的、设置行政区域的疆域范围,基本都是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内地。这一范围四周并不都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尽管王朝的军队一次次外出远征并获得胜利,但却很少将自己的正式政区扩展出去,根本的原因就是要考虑这些地区是否适宜农业生产,能不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人们在所能得到的十分有限的狭小地块上辛勤耕耘,精耕细作,对土地实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借以维持生存。久而久之,不但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促成了中国人安土重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勤劳善良的民族性格。

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无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它既是封建小农经济的基础,也是农业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如甲骨文辞中关于殷商统治者为祈求农业丰收而进行的种种活动;西周统治者每年举行的隆重“祭礼”,以及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关于“农者,天下之本”的告诫等等,无不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延续性,这与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古欧洲文明史明显不同。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一方面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进程和速度。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远古时代的村社经济残余,到宋元明清时期演变为乡族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乡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如三代以来的奴隶制经济残余,亦长期并存于农耕经济之中,直至明代,江南“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①。贵族分封制度,虽然从秦汉以后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历代不绝,如明代的藩王勋戚经济就成为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发展的横向考察,华夏民族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农耕经济是自然经济体系,这是借用了西欧中世纪庄园制自然经济体系的用语,实际上,中国的农耕经济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自然经济差异甚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西欧中世纪自然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依附农奴等,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并不很突出。中国的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由来已久,并且不时相互变换。中国的个体家庭经济,很

^①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



早就与市场有着一定的联系,早在战国时,孟子就指出农家“以粟易械器……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是“天下之通义”^①。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下述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产生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大量汉族(华夏)人口不断从黄河流域迁往南方、西北、东北各地,文化上的优势和数量上的多数使这些移民最终成为迁入地区的主体人口,他们所传带的文化自然也成为迁入地的主体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传统文化也吸取了牧业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基础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吸收便都以能否适应农业文明的需要为前提。前面已经提到,尽管中国的自然条件在以往数千年间有一定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幅度有限。由于中国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气候的波动一般只影响农业区的南北界、而不会减少它的面积,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中国内地的这片农业区的面积和产量在东亚大陆一直遥遥领先,供养着数量最多的人口,因而很自然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所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西方文明传人之前,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农业文明在总体上落后于中国,当然不可能对它形成冲击和挑战。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并多次以武力入主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弱者,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不适应于农业地区,因此军事上的征服者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他们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华夏文化。

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辽阔地域里,有足够广阔的空间创造自己的文化,演绎自己的历史。中国内部不但具有天然的向心性,而且在物质生产与供应上具有高度的内部互补,加之中国历来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形成高度的自给性和独立性。在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之上发展形成的农耕经济,加上中华先民的勤劳和智慧,使古代的中国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之前,长期成为世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度。这就更加深了“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自我陶醉、自我封闭的观念,使中国古代

^① 《孟子·滕文公上》。



长期以来一直缺少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动力。

在经济上对土地的过分依赖,一方面虽然限制了中国古人的视野,影响了对外的扩展与开放。但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中华民族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切情怀。中国地名多因依山傍水而得,体现出中华民族依托山水的内在精神;“山河”、“河山”、“江山”成为领土与政权的代称,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特殊感情;特别是历代兴盛、经久不衰的“山水诗”和“山水画”更揭示了活跃于山水环境里不灭的民族灵魂。这一切无不起到培养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内部巨大的凝聚力的作用。

三、儒家人文化发生的时代背景

公元前 722 年,在犬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平王东迁以后,周室渐渐衰落,首先平王的外祖父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幽王,申侯拥立平王,使平王有弑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攻伐,最后平王东迁,使周室只有一小块地盘,周王室因而衰微,周桓王十二年(前 708 年),由于边境问题与郑国争执,周桓王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说明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义罢了。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 43 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西周把宗族和功臣分封为各地诸侯,各诸侯又在领地范围内分封自己的宗族,既巩固对四方的控制,又传播了周的文化制度。在层层分封之中,周王——诸侯——大夫等级严格,有明确的权力和义务规定。西周时期人口稀少,诸侯带领宗族开发各地,相当于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各个诸侯国之间领土并不相接,中间有大片的森林荒地,出没着许多原始部落。因此各诸侯国之间利害冲突不明显,面对周围敌对部族的侵袭,反而要时相救助。



春秋时期封建制的衰败——礼崩乐坏：从西周到春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周王和诸侯之间，诸侯和诸侯之间，诸侯和大夫之间，原有力量平衡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原来分封时期形成的等级制度也就无法保持。于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诸侯不尊周王，大夫凌越诸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 250 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 220 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①。同时，大国争霸的现象比较严重，各诸侯国已经渐渐统一领地内的异族部落，彼此的控制区域扩展相接，发生矛盾冲突的机会大大增加，晋、楚、齐、秦、吴、越等处于边地的诸侯由于向外兼并发展的空间很大，实力增长更为明显，日益成为争霸的主角。但春秋时期传统还没有完全废弃，所以争霸表面上常以尊周为号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轮流上演着争霸战争和结盟之会。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问鼎。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时起干戈，小者弱者成为大国的战场，法律与秩序只凭个人的武力与诡谋来维系。贵族的狩猎、战争与骄奢的生活，使得平民困苦，生命犹如草芥。

四、儒家人文化发生的学术背景

（一）学术源流

中国人文化思想开端久远，大德广播。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人文化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以前。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都十分重视人格精神的培养和人生责任的教育。据《尚书·舜典》记载，虞时即设有学官，管理教育事务，如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负责对人民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命夔“典乐”，即负责对人民进行音乐和诗歌教育。

从人猿揖别、文化开始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②，中国文化在自身的生命运动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然而，其社会组织结构方式，婚姻演进方式，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包括图腾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在内的精神生活，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脐带”。至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① 《孟子·离娄上》。

^② 《史记·夏本纪》。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徙,史称“不常厥邑”。

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 273 年。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虽然“诘屈聱牙”,散漫无序,但其间已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礼记·表記》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商人有祖先崇拜,但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位,而其之所以被祭祀,也在于他们生前担任最高祭司的职务,死后“宾于帝所”,侍于帝左右,成为上帝与人世的交通桥梁。

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智力、体力水平不断增进,对神的力量崇拜渐次淡薄,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人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它曾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并利用商纣的腐败和商人主力部队转战东南淮夷之机,起兵伐纣。公元前 11 世纪,“小邦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制礼作乐”。